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8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

跨文化交际学基础

Guo-Ming Chen William J. Starosta 著



跨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策划编辑 梁晓莉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封面设计 彬

《跨文化交际学基础》一书从“基础研究”、“文化语境”、“跨文化互动”、“跨文化应用”和“跨文化交际伦理问题与未来”五个方面对跨文化交际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所进行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其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全面而深刻的介绍和评论，并对跨文化交际活动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未来进行预测。本书信息量大，内容编排设计精心，着重理论探讨，集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于一身，对于中国学者在未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跨文化交际学科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ISBN 978-7-5446-0312-6



9 787544 603126 >

定价：38.00 元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8

G115/Y1

:7

2007.

跨文化交际学基础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著 Guo-Ming Chen William J. Starosta ◎ 著

林大津 尤泽顺 ◎ 导读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uo-Ming Chen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William J. Starosta
Howard University



Allyn and Bacon

Boston • London • Toronto • Sydney • Tokyo • Singapo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交际学基础/林大津, 尤泽顺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ISBN 978-7-5446-0312-6

I. 跨… II. ①林…②尤… III. 文化交流—研究
IV. 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789 号

图字:09-2007-232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and sold elsewhere.

本书由 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集团授权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印 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592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978-7-5446-0312-6 / H · 0149

定 价: 3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胡文仲(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哈尔滨工业大学)

副主任

Bates Hoffer(美国三一大学)

Nobuyki Honna(日本青山大学)

Steve Kulich(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 凌(香港浸会大学)

高一虹(北京大学)

委 员

Andy Kirkpatrick(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Michael Prosser(上海外国语大学)

Richard Wiseman(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福勒顿分校)

Robert N. St. Clair(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

陈国明(美国罗得岛大学)

顾嘉祖(南京师范大学)

罗选民(清华大学)

申惠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许力生(浙江大学)

张惠晶(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

庄恩平(上海大学)

庄智象(上海外国语大学)

总 序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在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与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实,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将文化交流进行理论研究进而发展成“跨文化交际学”,还只是近四五十年间的事情。想要深入探究这门学科,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起源。

20 世纪 60 年代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各种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文化距离或是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与之相反的是,人们不能再旧有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同时,文化差异滋生众多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反而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矛盾和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利益或者领土的争夺,也不仅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隔阂——正是这些隔阂使“地球村”中的人们虽然身在“咫尺”之间,却有如隔天涯之感。

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自然而然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之地,其中以美国人类学家 Edward T. Hall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现在学界也一致将他的著作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 1959) 当作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

到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学者们把研究重点逐渐从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中的差异转到研究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动态多变的过程中去。以此为基点,William B. Gudykunst 等一批学者建构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的突破带来了学科快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学科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空前广泛的关注,跨文化交际学被引进大学课堂,相关的研究学会和专业学刊相继出现,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定期举行。现在只要在网上简单查询一下相关书目,我们就会发现此类专著多达几百种,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William B. Gudykunst 曾在其著作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一书中总结了 15 种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论研究和探索上的巨大进步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日臻成熟。

进入新世纪,“地球村”每个角落的每个公民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中,个人之间、社会全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由此,我们不难预见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在 21 世纪被逐步推向高潮。

在关注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虽然我国历史上早有注重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但是现代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还要追溯到上世纪的 80 年代。当时随着国内学界对于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不断重视,在“文化热”和

“反思热”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人文化成为新的热点,这无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扩大了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外语界的学者和教师成为国内首先接触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批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上世纪 8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十年。一方面,海外归来的学者把西方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法和教学实践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和开发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外延,开创了初步繁荣的研究局面。

外语教师 and 对外汉语教师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外语教学必须与文化相结合。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国内一部分外语院校首先推出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至今日,我国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外语院系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5 年,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探讨。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也在这次会议中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自学会成立以来,已定期组织了 6 次国际研讨会。同时有些院校也多次组织大型研讨会,广泛开展国内不同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

广大教师、语言学者们兼收并蓄,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版的专著和教材多达几十本,发表的论文也有 2 000 篇以上。他们研究和探讨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范围广泛;有些学者和教师的研究更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了自己的视角独特的观点。

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跨文化交际研究比其他学科更需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推动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世界范围上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研究会中有不少教师学者同时也是国际学会会员,他们或在国际学会组织和国际期刊中承担重要工作,或是经常受邀参加在海外举行的学术会议,在会上交流论文。不少论文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也在国外出版他们的专著,传播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这 20 余年的学科发展,我们也应清楚地意识到前进路上存在着的诸多问题。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王宗炎先生所指出的“收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William B. Gudykunst 教授也曾指出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其次由于理论指导不足,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对比方面,对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尚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拓展,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推动此领域的学科建设,加强此领域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以满足广大教师、研究生以及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于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考虑,决定推出“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丛书既引进国外权威力作,也出版我国学者的著述,还有中外专家的合力之作。我国读者可以通过这套丛书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在领略我国学者

和专家的新思维和新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各种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相信“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对于今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代表丛书编委会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年4月

导 读

一、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

跨文化交际活动自古有之,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仅仅视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日常现象,没有意识到这种交际活动本身的特殊性,更未能对其进行深刻的理论研究和考察。20世纪中叶,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美国人或在本土或在国外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愈来愈频繁。面对新局势,美国人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性知识,因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全面认识而导致的交际失误比比皆是,使其跨文化交际活动举步维艰,美国的大国信心和国际抱负由此受到严重的挫折。美国政府和国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美国的多元化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如何让美国人能够与其他文化的人更顺利地交往。这种跨文化意识的觉醒促使来自各个领域的美国专家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对跨文化交际活动进行研究。

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先行者主要来自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交际学、民族学和符号学等领域。他们研究跨文化交际活动一方面出于个人兴趣,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为了解决美国人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胡文仲,1995:35),因此,在构建专门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理论和创建独立的跨文化交际学科等方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立场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早期的研究者在解释文化现象和跨文化冲突时往往简单地以传播学研究为基础,直接或间接借用上述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或者引用这些学科涉及的研究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致使早期研究的理论基础薄弱,研究课题缺乏明确的方向和重点,研究结论缺乏可重复性,甚至相互矛盾。此外,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角度的差异,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认识也处于混乱状态。最典型的莫过于对 communication 一词的理解。虽然大家都使用这一词语,但赋予它的含义却不尽一致,这也是为什么与之对应的汉语翻译有“交际”、“交流”、“传播”、“传意”、“传通”、“沟通”等等。

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逐渐得以明晰,研究活动进展迅速,使跨文化交际学最终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理论构建不断取得新突破并逐渐走向成熟。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建构、理论应用等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将过去几十年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历程、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及其最新进展进行一番梳理,全面而深刻地介绍给对该领域有兴趣或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读者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总结以往研究的成绩和不足,而且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陈国明教授推出的《跨文化交际学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一书正好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它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跨文化交际学的各种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尤其着重介绍和评价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各种理论及其应用。

在传播学领域,跨文化交流学(广义上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实际上由三个部分构成:跨文化交际学(狭义上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国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和发展交流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Gudykunst & Mody, 2002: ix-x)。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重点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面对面交际;跨国传播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媒的跨国信息传播,讨论信息流通中的权力、政治及其对他国产生影响的传播过程等;发展交流研究的重点是作为传媒机构的国家和跨国公司、信息类型、信息内容以及传播的信息是如何谋划(民族、地区、语言、性别等)群体的目标、发展模式和部门需求等。(ibid.)按照这种分类,《基础》一书实际上是以跨文化交际学为研究重点,介绍和评价了跨文化人际交流和群体交流的相关概念、理论、研究方法以及这些理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中的具体应用。

就跨文化交际学来说,存在两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研究领域:跨文化对比研究(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跨文化交际过程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前者主要是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不同文化交际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文化要素,研究重点更多的是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进行静态的对比和分析,比如对比价值观的差异、非言语行为的差异、思维模式的差异、会话策略的差异等,可以说它的侧重点是文化差异研究。后者主要是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来讨论跨文化交际过程所涉及的各个交际环节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研究的重点是解释跨文化交际过程的动态变化,比如跨文化交际过程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如何构筑意义和身份、如何适应异文化、如何处理跨文化冲突等,即它的侧重点在于交际过程的动态建构。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整个历史发展来看,早期的研究更多的是属于跨文化静态对比研究,较少涉及交际的动态过程;中后期的研究则是对比研究与动态过程研究相结合,同时侧重于动态过程,即大多数研究都是在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力图对交际过程的动态变化提出新的解释。之所以如此,可以说与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不无关系,同时也是因为“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是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的先决条件”,(Gudykunst & Mody, 2002: ix),即进行文化差异的静态对比是开展交际动态过程研究必须跨越的门槛。换句话说,由静态对比转向动静结合并侧重动态研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提升,也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和跨文化交际学科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基础》一书同时包括了上述两种类型的研究,从该书的布局看,其结构思路与跨文化交际理论发展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该书先介绍和评论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历程和相关的核心概念,然后转入介绍和评析文化差异静态对比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解释交际动态过程的理论,最后讨论了理论研究成果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应用,并就跨文化交际活动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初步预测。全书最精彩部分当属讨论各种研究交际动态过程的理论章节,作者对当前流行的各种理论和理论模式进行了介绍,指出了这些理论的不足,并提出了将来的研究方向;作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观点、研究角度和理论范式;作者还尝试着介绍和评论共存文化间的凝听(listening across cocultures)等尚未受到足够关注的理论研究。

作为全面总结和评论跨文化交际研究及其理论的著作,《基础》的特点之一是:在评介有关理论时尽量采取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的方式(这一点作者在前言里已经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见 Chen, 1998: xi-xii),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1) 尽量让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的学者在其中展开对话,如社会科学角度和历史阐释角度的对话、国际和国内视角的对话、研究维度与经验维度的对话等;同时,只要与本领域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关,大多数议题都得到

相应的讨论;2)采用专题的方式评介相关理论,在同类著作中信息量最大,涉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和传统议题到多元文化主义、跨文化培训、跨文化凝听和跨文化交际伦理学等新近议题,其中有些议题在其他同类著作中要么没有,要么只是一种“擦边球”,如跨文化培训所讨论的“培训的实际操作和职业取向”及跨文化交际伦理学、跨文化凝听、跨文化关系构建等;3)在讨论复杂的理论观点时强调先对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进行简单易懂的介绍,形成以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理论阐释;如此精心的内容编排对于跨文化交际学专业和相关课程的初学者来说无疑是一本理想的学习用书;4)每章结尾都有专门的“小结”和“反思”两个部分,小结部分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和掌握整个章节的内容,反思部分则主要是促使读者对讨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鼓励读者去直接面对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使读者不仅能够批判性地思考相关问题,同时还能亲身参与跨文化交际研究,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作贡献,这种设计在其他同类著作中不是常见的。

《基础》一书的另一特点是:评介相关理论时坚持遵循作者本人一再强调的“平等对话”(equal dialogue)和“不带偏见的判断”(nonprejudicial judgement)等原则。当前,西方在科技文化等所有领域几乎都处于优势地位,在此情况下,西方(特别是英美)“文化帝国主义”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渗透到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许多非西方国家为了抵御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不惜一切代价地高举“民族中心主义”的大旗,捍卫和发扬本国(民族)文化。这两种立场的对抗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跨文化交际研究更无法例外。作为最早发端于美国的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力军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和欧洲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近年来,亚、非、拉各国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研究中,但不管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从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来看,美国学者的研究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这种现状不可避免地造成许多理论和观点有意或无意间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非常不利。面对这种状况,本书一方面尽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和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坚决拒绝民族中心主义立场,这至少体现于以下三个侧面:首先,针对各个专题,作者都尽可能地评介各种相关理论及其研究,无论这些理论是美国学者提出的,还是其他国家学者提出的;其次,对于每一种理论,它都采用二分法进行讨论,既指出它的创新之处,又指出它的不足和局限性;再次,作者本人也在研究实践中尝试采用一些非西方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借用中国道家文化的八卦来描述人际关系的发展过程等。这一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不论妥帖与否,对于中国学者在未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和跨文化交际学科具有启示意义。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基础》是一本理论专著,但它没有背离跨文化交际研究(美国)传统中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如前所述,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出现最初是为了解决美国人在跨文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尽管这一动机在后来的研究中有所淡化,但它始终是推动跨文化交际学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动力之一,同时也使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研究始终与解决跨文化交际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一目的联系在一起。它的重点是对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各种理论进行梳理和评析,但它没有忘记“理论最终必须应用于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研究理念,因此,在对各种理论进行评价后,特地辟出专门的章节来介绍如何将各种理论应用于跨文化交际实践中,其中包括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来处理组织和群体中的文化多样性问题,如何培养个人在异文化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更好地通过跨文化培训来帮助受训者提高自己的跨文化调适能力等。这样一本着重理论探讨、集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于

一身的研究专著对于正从事或准备从事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各种人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本书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介绍

《跨文化交际基础》共分为五大部分,它们分别是:

第一部分:跨文化交际学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的核心概念

第一章 跨文化交际概述

本章点明了跨文化交际研究出现的最根本原因,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简要回顾,讨论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内容,最后介绍了本书的基本框架结构。为什么要研究跨文化交际?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科技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规模人口迁移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成为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地球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越来越频繁。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面对全新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和有识之士认识到,研究跨文化交际活动,让美国的多元化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让美国人能够与其他文化的人更好地进行交往,是美国实现其雄心抱负的前提条件。

20世纪5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萌芽阶段。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出版的*The Silent Language*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跨文化交际研究得到了初步发展,研究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陆续出现,与之相关的学术会议也不断召开,美国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相应的教材也随之出现。20世纪7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飞速发展的时期。1970年,跨文化交际学第一次以独立的学科出现。1972年,第一届国际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美国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教材建设也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研究继续飞速发展,研究重点逐渐从早期的文化差异静态对比转向跨文化交际过程的动态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身份得到进一步明确。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渐走向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出现关注同文化内各种共存文化的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就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内容来说,Rich认为包括跨文化交际学、跨国交流学、跨种族交际学、跨民族交际学和跨文化发生学五个领域;Stewart认为跨文化交际学最终应该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因此,跨文化培训应经历九个阶段;Gudykunst认为跨文化交际学应包括跨文化交际对比、跨文化交际学、跨国交流和大众传播对比研究。

第二章 交际与文化

本章对跨文化交际研究涉及的“交际”、“文化”、“跨文化交际”等相关核心概念进行讨论,分析了交际的特征和模式、文化的功能和特征以及跨文化交际的方式等。

文化与交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影响交际的模式,并在交际模式中呈现出来,交际则影响文化的结构。

交际不是线性机械的过程,而是动态的、交互式的和相互回应的过程。交际指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人们在其中通过符号交换建立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交际有四个特征:1) 交际是一个整体现象;2) 交际是一种社会现实;3) 交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4) 交际是一个有序的过程。

文化指的是“一系列经过协商的、用于指导个人行为并使他们成为一个整体的共有符号系统”。文化有两方面的功能:1) 它提供一种语境,使人类社会的语言、物质、心理三方面的内容得以深藏于其中;2) 文化为群体及其成员提供一种结构、稳定性和安全,使他们凝合为一个良好的运作系统。文化有四个基本特征:1) 文化是整体性的;2) 文化是后天习得的;3) 文化是动态发展的;4) 文化是无处不在的。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的交际”。由于交际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跨文化交际容易导致冲突。跨文化交际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三要素:1) 能否在情感层面上拥有积极的情感;2) 能否在认知层面上正确认识文化差异;3) 能否在行为层面上采取合适的行为和技巧。在实践中,跨文化交际依交际者意图的不同表现为三种方式:以自我为中心的对话;一方企图支配他方的对话;平等的对话。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对象是第三种交际方式。

第三章 文化感知和价值观

本章对文化对比研究所涉及的“感知”、“定型思维”、“偏见”和“文化价值取向”等核心概念进行讨论,分析了感知过程的各个阶段、文化对感知的影响、定型思维和偏见的起源与影响、价值观的本质、价值观与交际的关系等,重点介绍和评论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研究和对比分析的四种模式。

人们的行为方式是由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决定的。感知指的是“人们借助感官来感觉世界的积极过程”,即他们应用感官把外部刺激转变为有意义的经验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选择、组织和阐释三个阶段。面对纷繁的世界,我们只能选择感知其中的一小部分,选择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记忆三个步骤。然后,我们按照形状、颜色、质地、大小和密度对选择的事物进行归类,形成有意义的经验。最后我们赋予这些经验不同的意义。

文化对感知的重要影响往往反映在归因过程,即我们总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历史来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由于文化提供一种语境,让我们从所有的意义中提取想要表达的意义,因此,不同文化的人们常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和解释他人的行为。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感知方式的主观性造成感知不够准确,形成了定型思维、偏见和歧视等。定型思维是指采用过度概括或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界定一个群体;偏见是指建立在错误观念或先入之见基础上的教条化观点;歧视是指有偏见观点的具体实施。定型思维和偏见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习得过程、社会化和接触媒体等发展而来的,避免定型思维和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会与他人产生共鸣。

文化感知影响我们用于判断好坏和正误的价值体系。价值观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特有的对于‘什么是好?’的一种显露或隐含的观念,它影响着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方式表达出来,并由此影响着人们的交际方式。“文化价值取向”是用于研究价值观和交际之间关系的概念,指的是“人类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普遍

问题的方式”。对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主要有四种模式:克鲁克洪-施特罗特贝克模式;康登-优素福模式;霍尔模式;霍夫斯泰德模式。克鲁克洪-施特罗特贝克认为人类社会都面临五个共同问题,这些问题代表五种文化价值取向,根据对每个问题的三种不同回答就可区分出各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康登和优素福对克鲁克洪模式作了改进,将五个问题扩展为六个,将五种价值取向扩展为八种,形成一个总共有二十四个价值取向的综合性研究模式。霍尔根据语码、语境和意义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将不同文化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并按照从弱到强的方式将世界各文化排列在一个连续体上,依此表明不同文化在交际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霍夫斯泰德通过问卷调查对比不同文化工作环境中的价值取向,经过统计后确定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男性/女性这四个维度可以用于区分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

第二部分:人类交际语境,即言语、非言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语言与文化

本章讨论了“形态学”、“音系学”、“句法”、“语义学”和“语用学”等核心概念,分析了人类语言的结构、语言的特征、语言的变体,重点介绍和评论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价值取向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

语言包括言语和非言语。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科学,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语言学可分为形态学、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五个领域。形态学研究词和构词法。音系学包括语音学和音位学,前者研究如何发音,后者研究不同音的区分。句法学研究句子和词组的结构。语义学研究人类语言中的所指和意义。语用学研究语言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语言有四个特征:1)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2)语言是由规则规定的;3)语言是主观的;4)语言是动态的,有自己的生命循环。由于不同人在使用语言时有差异,因此就形成了各种语言变体,如方言、混杂语、洋泾滨、克里奥语、行语、暗语、禁忌语等。方言是某一群体特有的语言,不是全国通用语,它包括宗教语言、社会群体方言和民族方言。洋泾滨是由于军事占领区的殖民化而产生的用于交际的边缘性语言,它通常没有“本族语人”,其语言和语法结构由几种语言简单拼凑而成。当洋泾滨拥有本族语人并成为该地区永久性语言后,它就被称为克里奥语。混杂语是某个地区不同语言群体一致同意用于交际的混合语言。行语是某个行业为了满足特殊需要而使用的专门术语或技术性语言。暗语是非主流群体使用的一种秘密或独特的词汇,其意义通常被置换或与原义完全相反。禁忌语是被禁止或应该避免使用的词汇。

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萨丕尔、沃尔夫及其支持者认为语言不仅表达思维,而且塑造人的思维、信念和态度,语言决定文化模式;反对者则认为语言不是决定思维,而是反映思维,语言表达了文化。学者们在语言是否决定文化这一点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一致认为语言与文化存在密切关系。为了更好说明语言表达与文化价值取向的关系,作者应用康登-优素福模式对中国文化中家庭价值取向的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关系取向;位置角色行为;祖先敬奉。作者认为语言是人们学习和理解文化价值观的桥梁,只有理解了文化才能真正掌握用于描述该文化的语言。

第五章 非言语交际与文化

本章分析了言语交际与非言语交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重点讨论了非言语交际的功能和特征,非言语交际的结构,体态语、空间学、副语言、时间学等非言语行为,指出非言语交际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如何培养跨文化非言语交际技能等问题。

非言语交际与言语交际是人类交际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非言语交际与言语交际的区别有:1) 非言语交际不是有意识控制的行为;2) 多种不同的非言语交际可同时发生;3) 部分非言语行为既可用作跨文化语言,也可用作跨国语言;4) 非言语行为的学习比言语行为学习更早出现;5) 非言语行为在表达时更富有情感。非言语行为有五个功能:重复;替代;强调;抵触;协调。非言语交际的特征有:相对于言语行为来说,非言语行为缺乏系统性;非言语行为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非言语行为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非言语交际研究包括四个领域:身势学;空间学;副语言研究;时间学。身势学研究的是身体动作,如面部表情、目光接触、手势和身体接触等。空间学研究的是人类和动物在交际中的空间使用。霍尔将空间分为特征固定空间、特征半固定空间及非正式空间,非正式空间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亲密空间、私人空间、社交空间和公共空间。副语言研究关注的是交际中声音要素和声音信号的适应。特拉格将副语言分为音质、声音特性素、语音修饰特征、干涉音。时间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时间观念及其对交际的影响。研究的角度有两种:一是把时间观念分为以过去为导向、以现在为导向和以将来为导向三种;一是把时间使用分为一元时间取向和多元时间取向两种。

非言语行为与文化具有密切关系:非言语行为是由文化规定的;文化决定非言语行为使用的时间。非言语行为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根据里卡德的模式,其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评估学习需求;观察类似情景;合理运用资源;得出初步结论;必要时重新评估结论。

第三部分:跨文化交际动态过程的各种研究理论

第六章 跨文化人际关系的发展

本章讨论了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及人际关系的特征,重点分析和评价了区分人际关系发展阶段的各研究模式和解释人际关系发展的理论模式,指出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人际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提出应用文化协同理论构建第三文化是使跨文化人际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在于它是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人人都是关系网的一个节点,人人都参与网的编织,跨文化交际活动实际上就是在跨文化层面上编织网的过程。

人际关系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人们形成人际关系是为了满足归属、控制和情感三种社会需求。人际关系有五个特点:1) 人际关系是动态发展的;2) 人际关系是一种等级结构;3) 人际关系是相互的;4) 人际关系是独特的;5) 人际关系是相互依存和不可替代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必须经历一系列的阶段,不同的理论模式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区分。伯杰-卡拉布雷雷斯模式认为它包括开始接触阶段、私人关系密切阶段和退出阶段。德韦托模式认为它包括接触阶段、涉入阶段、亲密阶段、恶化阶段和解体阶段。纳普-万杰利斯蒂模式认为它分为走在一起和分离两部分,前者包括最初接触阶段、尝试阶段、

增强阶段、融入阶段和亲密关系形成阶段,后者包括分化、相互孤立、停滞、避免接触和终结。陈国明模式吸取道家思想,按照八卦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将其分为唤起、接触、靠近、接受、结友、亲密无间、出现分歧、重归静寂八个阶段。研究人际发展动态过程的理论有: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浸透理论;减少不确定性理论;交际顺应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一切交际行为都是在权衡得失后进行的。社会浸透理论认为人际关系能够发展取决于双方是否向对方敞开心扉。减少不确定性理论认为只有当双方都能够减少对对方的不确定性时,人际关系才能得到发展。交际顺应论融合了言语顺应理论和民族语言认同理论的观点,用于探讨交际者在社交语境和心理语境中采取何种交际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与交际者个人特征的联系。

人际关系的发展与文化差异存在密切联系。于姆认为,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人际关系发展差异可分为五种关系模式:单一文化主义/普世文化主义关系;长期/短期关系;圈内人/圈外人关系;正式/非正式关系;私人/公共关系。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还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形成过程,从避免不确定性策略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有言语/非言语差异、背景信息和态度、自我表露程度等。

对于跨文化人际关系的发展过程,斯塔罗斯塔和奥洛伦索拉认为“第三文化构建模式”是解释这一过程的绝佳模式。根据这一模式,跨文化人际关系发展过程按时间和循环顺序可分为文化内个体内在交流、跨文化人际交流、修辞性跨文化交际、元文化交际和文化内交际。

第七章 跨文化冲突处理

本章讨论了冲突的本质和类型,指出文化差异对冲突处理具有重要影响,分析了导致冲突的决定性因素,提出更加有效地处理跨文化冲突的方法。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冲突并造成不愉快情感是不可避免的,能否正确处理冲突关系到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冲突指的是处于相互依赖关系的个人为了互相满足对方需求或者追求某些工具性目标而产生的分歧。冲突存在于不同层次:个体内在冲突或主体内在冲突;人际冲突;群体间冲突;组织间冲突。

文化差异对冲突和冲突处理具有重要影响,思维方式、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交际过程中冲突产生和处理的方式不同。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卡普兰认为,英语族人喜欢归纳或演绎的线性思维,闪语文化(包括阿拉伯人)喜欢情感直觉型的论证方式,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喜欢间接方式,罗曼语文化允许论证过程中讨论其他主题,而俄语喜欢使用与主题无关的平行结构进行论证。就语言角度来说,讲不同语言的人往往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西方人更频繁使用直接言语表达,而亚洲人更倾向于间接表达。从文化语境来看,丁允珠认为弱语境和强语境文化的个人在冲突产生的原因、冲突产生的条件、对待冲突的方式和解决冲突的风格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在冲突出现和冲突处理过程中,有十个决定性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行为:面子、相互关系、关照、资历、地位、权力、可信度、利益、冲突的严重性、性别。

面子是指个体投射到人际关系网中的自我形象。相互关系是指双方的关系。关照是指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个人可作为礼物给予他人的物质和心理资源。资历是因年龄大而带来的权力。地位是指在收入、名望和权力等方面的相对位置。权力是指一方控制的资源受到另